

化。不过应该指出，在不同时代和地区，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往往具有不同性质。在民族关系紧张，存在严重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时代和地区，就民族文化交流 and 影响的主体而言，压迫民族的文化对被压迫民族文化的影响要大于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就民族文化交流 and 影响的层次而言，交流多限于对民族文化的表层（主要是生产工具、服饰、饮食、住、行等各种物质文化）产生影响，而对民族意识、民族认同感、民族自尊心等深层文化的影响要困难得多，“一边倒”或带有强迫性的文化传播也更易引起反弹，更有可能被认为是大民族主义、民族歧视或压迫。在民族平等和民族关系融洽、互相尊重的社会环境中，人口众多、经济发达、文化先进的民族对经济欠发达、文化较落后的小民族的影响一般要大些，但这种影响通常是通过自愿的选择，在不伤及对方民族自尊心的前提下实现的，而不是强迫对方接受的。同时，小民族的文化积极因素能够得到社会整体更多的认可和接受，并加以传扬光大。洞头乡汉族、侗族对苗族文化的认同和接受就是例证。

【译文选编】

编者按：北京大学1999年秋季开设了“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学生们翻译了课程指定的国外近期发表的有关论文，我们将选择其中一部分在本《通讯》中陆续刊载，以便向读者介绍国外民族社会学最新研究动态。

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加高兹个案⁴

查里斯·金（Charles King） 李霞译

摘要：本文考察了影响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制定全面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各种障碍。摩尔多瓦（Moldova）将权力移交给了其境内一个叫加高兹（Gagauzi）（信基督教的突厥人）的少数民族，文章集中探讨的这个个案被视为当地和平解决民族冲突的典范。1990年，摩尔多瓦政府与加高兹的关系达到最低点，那时，在是否承认加高兹为一个独立的政治实体的问题上，摩尔多瓦志愿军武装与加高兹的非正规军队处在爆发全面内战的边缘。在此之后，摩尔多瓦成立了一个被称为“加高兹耶里”（“加高兹之地”）的特别行政单位。与前苏联地区其它关于民族-领土的争论相反，加高兹这一个案表明，在坚持一种高度集中的一元化国家结构和将自治权移交给以联邦形式松散联系着的各单位这两极中间，存在着一个可进行多种政策选择的空间。

关键词：加高兹、少数民族政策、前苏联、摩尔多瓦、民族冲突、突厥族群、自治

在整个前苏联历史中，各民族群体要求地方自治或独立一直是地方民族政治的一个基本内容。在乌克兰，围绕着克里米亚半岛（Crimea）的地位的冲突一度导致了基辅（Kiev）与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出现危机，并加大了乌克兰中央政府与辛菲罗波尔地区（Simferopol）亲俄罗斯的领导层之间的关系的紧张度。在高加索（Caucasus），自1988年来，一次接一次地爆发了五次大的冲突；包括阿泽里人（Azeris）与亚美尼亚人（Armenians），格鲁吉亚人（Georgians）与阿布哈

⁴ 本文原载于英文《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杂志 Volume 20, Number 4（October 1997），pp. 738-756。



兹人 (Abkhazians), 格鲁吉亚人与南奥塞梯人 (South Ossetians), 北奥塞梯人 (North Ossetians) 与英古什人 (Ingush) 之间, 而最近的一次, 即车臣 (Chechen) 与俄罗斯中央政府的冲突导致了許多违背人权的行为以及数不清的生命与财产损失。

虽然这些冲突有着不同的性质, 其中有些是核心地区中央政府与边缘地区少数民族群体之间的对抗, 有些则表现为边缘地区内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 但它们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缺乏一种可选择的、有创造性的政策思路以控制冲突并减少冲突在相邻民族中扩散蔓延的机会 (Curr 1993: 133)。各中央政府总是把地方的自治要求看作是对国家领土完整的威胁。结果, 政府对此的反应不外乎或是断然拒绝边缘地区群体的要求, 或动用军事力量对其进行镇压。作为回应, 边缘地区少数民族往往在争执中以单方面提出“自治”、“主权”、或“独立”来增加赌注, 虽然这些地方的领导人很少能确切说明这些概念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不过, 正如本文将讨论的, 有可能制定出一些文化政策和关于地方自治的法律, 既满足地方民族群体的多数要求, 同时也保证国家领土的完整。在一个高度集权化的一元化国家与一个松散的联盟之间有着很宽广的政策选择范围。既然核心地区群体与边缘地区群体都依赖于在同一个国家内某种形式的持续存在, 那么就可以有很多种结构, 它既能保证国家领土的完整, 又能满足地方自治的要求 (Horowitz, 1985: 601)。选举地方议会及行政机构; 批准少数民族群体推选的政府组织和使用他们的文化象征物; 改革税制立法以允许地方领导人将财政收入用于地方发展; 划出行政管理边界以更精确地反映出地方居民的族群界线; 保证由地方选举出的领导人在中央政府中的位置, 这些都是在高度中央集权的国家结构与易于分裂的联邦结构中间的可能性选择。

更重要的是, 在边缘地区组建经选举出的政治机构, 赋予他们对当地资源及行政管理的有限度的权力, 这样会使得当地民族自身内部产生出相互竞争的利益群体, 从而避免冲突形成两极化。只要少数民族群体认为他们与中央的冲突是一种“零-和”游戏的竞赛, 在与占主动权的中央对立时, 他们就倾向于保持团结。但只要在一些基本的利益点上创造一些加以限制的渠道, 就会使少数民族内部的各竞争群体在与中央的关系问题上相互争夺发言权, 这样就降低了在冲突中“中央-边区”这一矛盾的重要性, 也打开了一个中央可与之谈判的更大的替代群体范围。

本文探讨的情况可以为前苏联境内及境外的民族-领土冲突的解决提供一个想象的模式。加高兹族——前苏联摩尔多瓦共和国的一个小的突厥系少数民族——的个案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案例: 这个后苏联国家即使在中央与地方之间已发生了武装暴力冲突之后, 仍通过对地方有关自治权的要求采用建设性和富有创造性的处理方法, 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达成了某种和解。但是, 一旦这些折衷的政策付诸实践后将会发生什么? 人口数量与分布的现实情况是否会阻碍设计完美的少数民族政策的实施? 正如我将在下文指出的, 即使是用意极好的处理民族-领土区争端的计划——包括更加关注少数民族文化的地位并将权力移交给以民族为基础的管理机构之意愿——一旦由理念转为具体实施, 便可能遇到极大的障碍。

加高兹的社会及文化地位

处在欧洲各大帝国——哈布斯堡王朝、沙皇俄国、奥斯曼帝国 (Ottoman) 和苏联——的交汇点, 现在作为独联体成员国之一的摩尔多瓦共和国, 一直是个多种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混合地带。说罗马尼亚语的摩尔多瓦人目前占400万总人口数的65%, 而乌克兰族 (14%) 和俄罗斯族



(13%) 构成摩尔多瓦的少数民族主体。

在共和国不同少数民族中, 母语为土耳其语系的西南分支之一的信奉东正教的加高兹族, 其社会及文化地位在许多方面是独特的。首先, 摩尔多瓦的大约153, 000加高兹人(占总人口的4%)的民族起源一直是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Moshkov, 1904; Hoppe, 1934; Wittek, 1951-2; zajaczkowski, 1960)。研究者们提出了多达十二种各自独立的有关加高兹民族起源的理论(Zajaczkowski, 1974; Dron, 1992: 24; Gradeshliev, 1994), 甚至在族名“加高兹”的起源及拼写问题上, 争论也毫不减少(Dron, 1992: 29; Gungor and Argunsah, 1993: 1)。

过去十年中, 一些学者指出, 加高兹人是从前居住在黑海沿岸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与库曼(Cuman)部族的后代, 或者他们就是安纳托利亚突厥人(Anatolian Turks), 只不过名称不同而已(Kowalski, 1933: 11-12)。另外一些学者则把他们定为基督教化的或“保加利亚化”的突厥人, 或“突厥化”的基督教保加利亚人, 或是这二者的某种结合(Wixman, 1984: 70)。他们是何时、在何种情况下来到现在他们所在的南摩尔多瓦地区, 同样是个有争议的问题, 虽然多数学者看来认为保加利亚人和加高兹人大致是在18世纪晚期或19世纪早期紧接着俄土战争之后从巴尔干半岛迁至南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地区(在罗马尼亚语和土耳其语中这一地区被称为 Bugeac 或 Bucak)(Kuroglo and Marunovich 1983: 11)。另一些学者则试图证明 Bugeac 地区是加高兹人传统的民族居住地而反对任何将他们视为这一地区的移民的理论, 不管说他们是多久以前到达的(Marunovich, 1993)。这一观点就使加高兹人成为了南摩尔多瓦地区唯一真正的土著居民, 多数学者对此不很赞同, 责备这一观点是非学术性和宣传性的, 不利于摩尔多瓦国家的政治稳定(Iuncu, 1990)。

其次, 加高兹人是摩尔多瓦共和国内语言上最俄罗斯化而“摩尔多瓦化”最弱的群体。根据1989年苏联的人口普查结果, 认为自己能够熟练运用俄语作为第二语言的加高兹人的比例, 比摩尔多瓦其他族群为高。大约有72.8%的加高兹人报告说俄语是他们的第二语言, 这个数字比十年前的68.4%升高了(Anuarul, 1994: 64-65)。报告说能将摩尔多瓦语作为第二外语流利使用的人数, 加高兹人在各民族群体中占的比例最低, 在1989年摩尔多瓦语被宣布为官方语言后⁵, 这种状况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只有4.4%的加高兹人报告说能熟练掌握摩尔多瓦语, 而在乌克兰人、俄罗斯人、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群体中, 有10%以上的人懂摩尔多瓦语。看来多数加高兹人的确还保存着一些他们自己母语的知识, 或者说至少他们认为, 报告说拥有这些知识是自己民族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约91.2%的加高兹人报告说加高兹语是他们的“母语”(rodnoiiazzyk), 这就使他们在对“民族语言”的依附性上排在第三位, 仅次于俄罗斯人和摩尔多瓦人。所以大多数加高兹人成为布瑞安·斯爱瓦(Brian Silver, 1975)所描述的语言“狭隘者”和“未同化的双语者”之类, 很少人完全同化于俄罗斯人或摩尔多瓦人。

第三, 摩尔多瓦已经成为加高兹人事实上的家园,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加高兹人居住在摩尔多瓦的比萨拉比亚地区(Moldovan Bugeac), 其它一些社群则集中在乌克兰西南和散居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在前苏联以外的少数加高兹标准文书或民族历史记载⁶很个别化和情境化地区分出“加高兹人”(gagauz)、“土耳其人”(Turk)“加高兹土耳其人”(Gagauz Turk)。

⁵ 虽然“摩尔多瓦语”与罗马尼亚语并没有什么区别, 但很多当地的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们始终强调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我这里采用摩尔多瓦政府的官方提法。

⁶ 最近在编撰加高兹语音词典和民族历史方面所做的努力包括Pokrovskaja (1990), Marunovich (1993) 和Gungor 与Argunsah (1991; 1993) 的著作。



前苏联境外的加高兹人一般估计约为15,000人，有一位权威人士则认为实际上这一数字要高得多（Dron, 1992: 23）。据1989年人口普查结果，在前苏联各共和国内共居住着197,786加高兹人，其中153,468（77.6%）居住在摩尔多瓦，主要分布在巴萨拉比斯卡（Basarabasca）南部地区、科姆瑞特（Comrat）、辛亚迪尔-朗加（ciadir-Lunga）、塔拉克利亚（Taraclia）和瓦卡纳斯提（Vulcanesti）。其余的主要在邻近的乌克兰的敖德萨（Odessa）地区（Itogi 1993, part 1: 10; part 2: 6-524）。

第四，加高兹族长期是摩尔多瓦内社会及文化最不发达的民族群体之一。19世纪末，当现在的摩尔多瓦的大部分领土还是俄罗斯控制的巴萨拉比亚（Bassarabia）省的一部分时，加高兹族的文盲率男性为88%，女性约为98%（Kuroglo and Marunevich 1983: 13）。除了30年代有一个短暂的加高兹复兴时期外，加高兹人的状况在两次大战期间没有多大提高，在这个时期，巴萨拉比亚地区成为了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在1940年巴萨拉比亚被苏联吞并，成为“摩尔多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加高兹人的状况仍无多大改变。直到1957年，苏联才发展出了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的加高兹语字母表，但从这一年起至1990年，用这种语言只出版了33本小书（Angheli n.d.: 3 and 5）⁷。1957至1958年的学年中，在摩尔多瓦南部开办了一些以加高兹语为教学语言的学校，但1961年这种做法被取消而改为全部用俄语讲授课程（Tanasoglu, 1994）。加高兹语甚至都不再作为一项学习的课程。

即使不考虑教学语言，加高兹地区南部地区的中学教育质量相对而言较低。1990年，加高兹所有地区有较高学历教师的比例均比国内平均水平低，在一些地区，约有四分之一的教师只有中学毕业的教学证书而没有更高的学历（Central Committee n.d.: 1）。到1990年，只有647名加高兹人在摩尔多瓦的学院中接受高等教育，在基什涅夫（Chrisinau）国立大学，摩尔多瓦共和国的最高学府中，加高兹族学生只占全体学生的1.4%，在任何大学或学院里，这一数字都没有超过总数的4%（Zidu n.d.: 1）。高等教育学院的2,875名教师总数中，只有15名是加高兹族人（Central Committee m.d.: 4）。其结果是在共和国的行政机构中很少发现有加高兹人。一些相对人口较少的民族群体——如犹太人（占总人口的1.5%）和保加利亚人（占2.0%）——在城市和乡村行政机构中工作的比例均较加高兹人为高（Anghli m.d.: 8）。

加高兹族的最后一个显著特征是：在摩尔多瓦所有主要民族语言中，只有加高兹人的母语既是主要的“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的对象，又是“自体规划”（corpus planning）的对象，即是说，不仅是加高兹语相对于摩尔多瓦语、俄语和其他地方语言的适当地位是个有争论的问题，而且标准加高兹语本身的字母表、语法及专门词汇还处于不完善状态。80年代末期之前，在使加高兹语现代化和提高其作为一种可操作的文学语言表达方式的功能方面，几乎没有做任何努力。

1957年7月，共产党通过了一个斯拉夫字母表，并早在1950年就提出过一项详尽的临时性计划，要在摩尔多瓦和乌克兰的中学教授加高兹语。但是，1961年以后，加高兹语便从摩尔多瓦的学校体系中（在更大范围上，从一般的文化生活中）消失了。第一本加高兹语的诗集于1964年出版（Romanov, 1968: 4），但是很少其它加高兹语文学作品在苏联时期出版。摩尔多瓦科学院的“加高兹学家”完成了一些民族志研究，但这些研究无一例外地是以俄文发表的，只偶尔有一些会翻译成加高兹语。1969年至1980年间，只有不到25篇关于加高兹民族志的重要文章和专题论文发表（Ionova, cojuhari and Pistica, 1982: 523-5），整个战后期间，包括翻译的书在内，只有不超

⁷ 这里从《摩尔多瓦共和国社会政治组织文档》中引用的一些文献在调查的时候（1993年夏）还没有被全部编目。它们存放在摩尔多瓦共产党中心委员会的卷宗中。



过35到40本书是用加高兹语出版的（Arnaut, 1993: 2）。目前在已独立的摩尔多瓦，对加高兹族知识分子来说，解决其语言的字母表、拼写方法和专门词汇的问题是极紧迫而重要的。

改革下的民族动员

80年代后期，摩尔多瓦与当时苏联很多主要成员国一样，也发生了群众示威活动和政治骚乱。面对当地共产党领导层对由莫斯科发动的开放和政治自由化进行抵制的局势，在首府基什涅夫开始形成了地方的反对组织。1989年中期，一些原来各自独立的文化和社会组织结合成“摩尔多瓦民众阵线”（Crowther, 1990）。

加高兹主要组织的代表——“加高兹人民”（Gagauz People）——也出席了1989年5月召开的“民众阵线”的成立大会（Busuioc, 1989）。几乎和“民众阵线”同时成立的“加高兹人民”，是由加高兹的中心科姆瑞特市的一个非正式文化俱乐部转化来的（Socor, 1990: 9）。当地不发达、贫穷、教育落后的状况使加高兹的知识分子和地方政治精英们热切地支持“民众阵线”的改革目标。加高兹组织的目标和战略实际上是模仿“民众阵线”的目标和战略。他们的目标都在于利用戈尔巴乔夫的公开政治和政治改革来对抗保守的地方政党精英，他们都意识到有必要用政治重建和公开性之类寓言式语言来掩盖对民族重建的要求。

但是，作为“民众阵线”基础的这种多民族联合被证明是脆弱的。1989年3月，对新一届苏联议会，即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使很多公开宣称支持“摩尔多瓦”（罗马尼亚）民族重建的人进入了联合立法会；“民众阵线”成立后，这些作家、艺术家和其他知识分子越来越认识到摩尔多瓦内部战线的划分是在民族名义的团体与亲俄的共产党领导之间进行的。复兴本土的摩尔多瓦（罗马尼亚）语言及文化就成为“阵线”的行动焦点。1989年8月，摩尔多瓦议会在“阵线”的强大压力下通过了一系列新的语言法令，这之后，“阵线”采取了更为排他性的倾向。新法令规定摩尔多瓦语的书写方式要回归为拉丁字母（这样就使其与罗马尼亚语区别开来），称其为共和国的“国语”，并设定了一系列最后的期限，要求许多国家公务员在此之前须熟练掌握这一语言（Actele, 1990）。除了对这些新的语言法令的不安，一些“加高兹人民”的领导人还害怕“阵线”在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关系问题上日趋明确的主张。“阵线”成员日益强烈地呼吁重新评价1940年苏联对巴萨拉比亚的吞并，并呼吁就重归以前的罗马尼亚祖国问题展开一次公开的辩论。这类呼吁不仅吓坏了加高兹的民众，也挑战了加高兹地方领导的既得利益：虽然“加高兹人民”是以文化组织的名义成立的，但这一组织的许多支持者是南摩尔多瓦地区行政精英成员。这些行政官员本指望利用这一运动作为向摩尔多瓦中央政府索取政治和经济上的更大让步的手段；他们中的大多数更乐意仍作为苏联的一部分，而坚决反对“阵线”这种“泛罗马尼亚主义者”的新趋向。

1989年9月，作为对“人民阵线”激进主张和基什涅夫与莫斯科对峙局面明朗化的回应，加高兹领导人宣布在南摩尔多瓦成立一个自治的加高兹共和国。整个89年后半期和90年初期，摩尔多瓦中央政府与科姆瑞特的自称的行政总部间的紧张度不断升级。1990年2月的国家议会选举是激化摩尔多瓦与加高兹矛盾的主要催化剂。在这次选举中，主张独立的“阵线”的领导人在好几个选区内击败了共和国的许多共产党高层领导人。对于加高兹人来说，这样一种选举结果是向泛罗马尼亚民族主义进一步推进的一个信号。确实，选举后被任命为首相的阵线领导人梅西·加克（Mircea Druc）就多次谴责了加高兹领导人；1990年8月，当加高兹宣布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共



和国时，摩尔多瓦政府宣布“加高兹人民”为非法，并号召摩尔多瓦人民拿起武器来反对加高兹分裂主义者。一车车的摩尔多瓦志愿者被派遣到加高兹地区，如果没有苏联内务部军队的干预，摩尔多瓦与加高兹非政府武装者间全面战争的爆发将是不可避免的（Fane 1993: 144-5）。在这一时期，加高兹得到了摩尔多瓦东部在政治与军事上都更强大的另一块宣布为分离主义者的飞地“特兰斯尼斯垂摩尔多瓦共和国”（Transnistrian Moldovan Republic）的支持；这两个集团有时候会携手合作，而川斯尼斯垂把加高兹作为反抗基什涅夫的第二道防线（King, 1994-95）。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基什涅夫与科姆瑞特间的争端解决没有任何进展。1991年8月的莫斯科政变加深了这两方的裂隙。作为对政变的回应，1991年8月27日，摩尔多瓦议会宣布成为一个独立的摩尔多瓦国家，而加高兹领导人欢迎这场政变，并准备抢先从苏维埃联盟中脱离出来。与苏联其它各共和国中的少数民族群体一样，加高兹也认为，不断增长的地方民族主义浪潮——而不是苏联的“国际主义”——会对他们的语言、文化及其民族身份构成极大威胁。

苏联解体后摩尔多瓦的文化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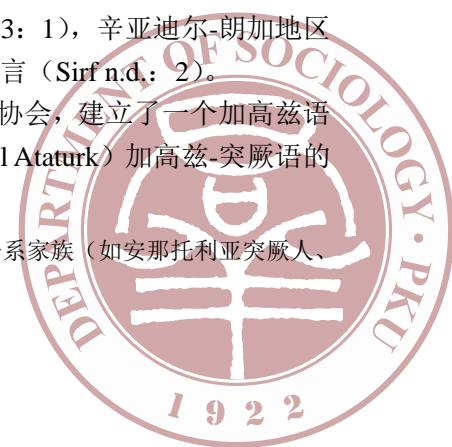
80年代后期起，摩尔多瓦政府就努力想处理加高兹特有的一些问题并试图抚慰激进的加高兹领导层。共产党的公共教育部在1989年至1990年在南部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1989年8月议会成立了一个特别的“加高兹问题”委员会。一年后，政府又建立了一个专门针对加高兹事务的咨询委员会（Socor, 1990: 11-12）。国家民族关系部，一个作为国家与非政府文化组织间联系纽带的政府机构，也集中精力在加高兹事务上发挥着作用。这个机构永久性地任用了两名加高兹专家，其中一位还被任命为加高兹文化协会“弟兄情谊”（brotherhood）的主席，这个协会是1991年10月成立的（Bozbei, Sirf and Ocunsaia, 1994）。

尽管摩尔多瓦政府与科姆瑞特的加高兹领导人之间存在政治争端，但自80年代后期始上述对加高兹地区的关注措施还是产生了影响。自1988年起，一份加高兹语的新闻周报“母语”（Ana sozu）作为摩尔多瓦主要日报的副刊定期发行；这份报纸的题词语“让突厥人生活在母语中！”（Ana sozu ile oguzluk yasasin）毫不含糊地将复兴加高兹的语言和文化宣布为自己的目标⁸。一所由摩尔多瓦政府和私人捐款建立的加高兹大学1991年在科姆瑞特开始招生（‘Universitatea’ 1991: 1）。1993-94学年间，有1,039名学生在这所大学的农学系、经济学系以及“民族文化”系三个系学习；约有60%的教职工说加高兹语，加高兹族学生的比例由1991年的约43%上升到1994年的超过70%（Tanasoglu 1994）。在其它主要高等院校中加高兹族学生的人数也在增长，1992-93学年时，加高兹族学生的比例已占学生总人数的2.4%，而在1989-90学年时，这一比例仅为1.4%（Anuarul 1994: 165）。

直到1993-94学年的中期，加高兹语在任何公立学校中都还未作为教学语言使用，但已有44所学校将其作为一门学习课程（‘Inapararea’，1994: 2）。科姆瑞特、辛亚迪尔-朗加和瓦卡尼斯提（Vulcanesti）地区的几所幼儿园也开始教授加高兹语（‘Komrat’ 1993: 1），辛亚迪尔-朗加地区的一所私立高中将英语、突厥语和罗马尼亚语交替作为学校的教学语言（Sirf n.d.: 2）。

1990年后陆续在基什涅夫成立了一个加高兹作家联盟、一个妇女协会，建立了一个加高兹语图书馆，在科姆瑞特成立了一个稍小一点的科麦尔·阿塔特克（Kemal Atatürk）加高兹-突厥语的

⁸ Oguzluk实际上是“突厥系”的特殊的一支，是指那些形成为现在西南部突厥语系家族（如安那托利亚突厥人、加高兹人、阿扎里斯人和土库曼人）的部落。



图书馆，摩尔多瓦的电视台和广播电台每月定期用加高兹语进行广播，在科姆瑞特建立了一个小的电视台和一个加高兹电影制片厂（Sirf n.d.p.3; Polozoglo, 1994）。考虑到摩尔多瓦在民族语言出版和文化项目方面资金缺乏的状况，这些成就就显得更加难得。以阿塔特克图书馆为例，虽然它只有两个房间和几百本书，但这些书大部分都是那些去伊斯坦布尔的加高兹族旅游者用装满了突厥语出版物的超重旅行箱一车车载回来的（Tavasanci, 1994）。

虽然在摩尔多瓦政府和市民们个人的努力下，加高兹族的语言和文化相对成功地在公众中提高了其可见度，但对加高兹语的规范化和现代化仍是一个问题。1993年5月，摩尔多瓦议会批准通过将加高兹语的斯拉夫字母转换成拉丁字母，当年9月，在基什涅夫每月出版的《母语》已转为以新的字母出版（Baboglu, 1994）。不过，《母语》使用的，经摩尔多瓦科学院详尽说明过的字母表既不同于科姆瑞特当地加高兹政府采用的，也不同于摩尔多瓦中央政府批准通过的⁹。

到1996年夏，无论是摩尔多瓦还是加高兹，在这一方面看来双方都没有按照各自宣称的方案来施行。除了用加高兹语来命名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外，《母语》整个是以标准的土耳其语版本出现的（包括使用土耳其语而非突厥语中的独特字母g）。同样，由科姆瑞特官方正式通过的拉丁字母却还没有被当地报纸所采用。被称为“加高兹议会和政府喉舌”的官方报纸《新闻》（‘Haberlar’）到1996年夏还完全采用的是斯拉夫字母；而且，除了报头和一两篇短文章外，这份报纸的绝大部分使用的仍是俄语。与之相似，其它的地方性报纸也几乎都是以俄文出版的。

加高兹语言规划的这种混乱、矛盾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基什涅夫的加高兹族知识分子与居住在南部地区的加高兹族知识分子间的分歧。那些不仅要求自治，还要求完全独立的激进加高兹族知识分子大多聚集在科姆瑞特的地方政府、“加高兹人民党”（“加高兹人民”的后继）、阿塔特克图书馆和那所规模不大的加高兹大学的周围。即使是在这个群体内部，在何为加高兹地区最合适的政治地位以及它与摩尔多瓦中央政府的关系问题诸方面也存在着很大的分歧。

另一方面，在基什涅夫的加高兹族知识分子主要在摩尔多瓦科学院、国家民族关系部和卡达斯里克（Kardaslik）文化社团中工作。由于充分意识到他们作为加高兹少数民族选出的代表而从中央政府所得到的好处，他们愿意与摩尔多瓦当局和解，将他们的目标限定为在一个统一的摩尔多瓦国家内实现加高兹民族的复兴。这两个主要群体间的界限是不太固定的，但是很显然，摩尔多瓦的加高兹族社群内部的这种冲突不可避免地减慢了达成加高兹问题全面解决的步伐。

土耳其方面的影响

摩尔多瓦官方很早就认识到，加强与土耳其的文化、政治与经济联系是缓解加高兹社群内部的这种紧张关系并使其最激进的派别确信中央政府具有诚意的一条途径。自独立以来，密切与安卡拉的关系不仅使加高兹获得了语言、文化规划所必需的基金和指导，而且还为加高兹提供了一个替代莫斯科的忠诚汇聚点。1991年12月，土耳其承认了摩尔多瓦的独立。次年二月，两国间在伊斯坦布尔签署协议，建立了外交关系。1994年2月，两国签署了更广泛的有关经济合作、贸易及农业发展项目的协定（‘Acord’ 1994），1994年中期，原来设在摩尔多瓦的土耳其领事馆升级为大使馆。而土耳其也是在摩尔多瓦设立大使馆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

⁹ 媒介公布的各种字母例表中有很多印刷错误，以至于现在仍不清楚哪种形式被认为是官方规定的。参见“Gagouz”（1993），“Hotararea”（1993），和“0 perevode”（1993）。



1991年之后的摩尔多瓦-土耳其关系在1994年7月土耳其总统苏雷曼·德米内耳（Suleyman Demirel）对摩尔多瓦进行国事访问时达到顶峰，这是自摩尔多瓦独立以来来访的最庞大、级别最高的外国代表团。德米内耳此行是在一百多名政策制定者和商业领导人的陪同下抵达的，他用了三天时间与摩尔多瓦总统米尔西·斯内格（Mircea Snegur）及摩尔多瓦的其他高级官员会谈，并签定了一系列加强经济与文化联系的草案和一个友好互助基本条约（‘Semnarea’ 1994）。德米内耳宣布土耳其将为摩尔多瓦提供3500万美元的一揽子帮助计划，其中大部分被指定用作改善加高兹地区的供水设备和基础设施（‘Gagauzskiaia’ 1994）。在德米内耳访问期间，他和斯内格一道访问了加高兹的主要城市科姆瑞特和辛亚迪尔-朗加，这一事件被加高兹领导人斯德潘·托佩尔（Stepan Topel）描述为加高兹族历史上“最辉煌的时刻”（Topel, 1994）。在他停留期间，德米内耳多次指出，加高兹是“土耳其与摩尔多瓦之间的一道坚固的友谊之桥”（‘Dorim’ 1994: 2）并特别提出摩尔多瓦境内“一个突厥民族”的存在使这一国家将继续成为安卡拉的商业及政治领导人特别关注的地方（‘Discursul’ 1994）。土耳其代表团这次出访在摩尔多瓦呆了三天而在乌克兰只停留了两天，这一事实本身也许就表明了土耳其人把加高兹放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地位上（Socor, 1994: 2）。

德米内耳的此次国事访问成为摩尔多瓦、加高兹和土耳其领导人间的长期接触史上的一个顶点。摩尔多瓦是1992年创立的黑海经济合作体（BSET）的创始成员国之一，这一计划是由土耳其已故的特加特·欧扎尔（Turgut Ozal）首先提出，并由他的后继者德米内耳所发展。自那以后，摩尔多瓦的领导人只要在讨论与土耳其的关系时，便会提到这一组织的重要性，虽然摩尔多瓦弱小的经济实力使其在这个“黑海商业及发展银行”的计划中所起的作用必然是微不足道的（Connelly, 1994: 36）。双边贸易和经济关系发展得很快。早在1992年，摩尔多瓦-土耳其的贸易总额已达1180万美元，使土耳其与美国一道成为摩尔多瓦在独联体之外的第四大贸易伙伴，1994年中期，有15项重大合资项目开始启动（Belen’kii, 1994）。

自1991年，通过它在基什涅夫的大使馆和土耳其合作与发展代理处（TIKA），安卡拉已为加高兹提供了可观的财政与教育支援。1992-93学年，有178位加高兹族学生就读于土耳其的大学，到1993-94学年，这一数字增加到约200；依照一个特别的交换项目，另有27位土耳其学生和3位土耳其教师在科姆瑞特大学学习或工作（Zanet, 1994）。摩尔多瓦的两个加高兹/突厥语图书馆的所需资金大多来自土耳其；为加高兹的艺术家、音乐家以及电视主持人安排了许多交流计划；一所教授英语-罗马尼亚语-突厥语的私立高中于1993年9月在辛亚迪尔-朗加正式开始招生；自摩尔多瓦独立以来，一系列其它的援助项目开始启动（Zanet 1994: 2-3）。1994年初，安卡拉宣布它将向辛亚迪尔-朗加（加高兹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少数几个城市中心之一）捐助一整套印刷设备以资助加高兹语实现向拉丁字母的转换（‘Publicatii’ 1994）。

土耳其的介入，尤其是它对加高兹语言和文化发展的关注，是出于一系列利益的考虑。在外交政策上，安卡拉一直密切注视着布鲁塞尔，希望在巴尔干和黑海地区扮演一种积极的角色以证明其欧洲身份。这样，介入摩尔多瓦与加高兹南部地区的民族-地区冲突是土耳其意欲在东南欧洲扮演和平斡旋者这一更广泛的兴趣的一部分。更何况，虽然摩尔多瓦的加高兹人在整体规模上远小于其它还未独立的突厥民族如雅库特人（Sakha即Yakuts）或者鞑靼人（Tatars），但它仍是前苏联西部边界的最大的一个与其有亲缘关系的突厥民族。在乌克兰、贝拉如斯（Belarus）和波罗的海区（Baltics），最大的突厥语系民族群体也未超过其总人口的百分之一，而加高兹是摩尔多瓦



的四大民族群体之一，其人口占总人口的3.5%。这样，在土耳其加强与前苏联各突厥民族联系方案中，加高兹就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而且花费低廉的）目标群体。而且，大体上说，加高兹人比其它突厥民族更愿意接受土耳其的帮助和影响。而在亚洲中部的各共和国内，由于存在规模较大的俄罗斯各少数民族和伊朗的经济影响，本土民族较不热心于突出他们的突厥族身份，与之相比，加高兹则特别合作。实际上，最近一些有关加高兹族书籍（这类书在前苏联境外是很少见的）的出版，大部分得到了土耳其政府的资助（Dogru and Kaynak, 1991; Gungor and Argunsah, 1991; 1993）。

在处理加高兹问题上，安卡拉很注意将其继续的帮助和支援与摩尔多瓦领土完整的概念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策略就削弱了加高兹的一些激进派所宣称的摩尔多瓦政府意欲对少数民族实行“摩尔多瓦化”或“罗马尼亚化”的观点。正如德米内耳在摩尔多瓦议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的，他们对加高兹继续援助的前提是加高兹人作为统一的摩尔多瓦共和国内之公民（‘Discursul’1994）。

地区自治：“加高兹耶里”

除了努力提高加高兹地区文化与经济的不发达状况和建立起与安卡拉的联系纽带之外，摩尔多瓦政府还赋予了南加高兹区域以特殊的地区地位。给予加高兹以地区自治的提议过去曾遭到摩尔多瓦政治势力两极的共同反对。泛罗马尼亚主义者集团认为自治有损于最终将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统一起来的目标；承认加高兹对南摩尔多瓦的控制会从根本上损害其论点，他们强调，摩尔多瓦根本上是罗马尼亚的领土，只不过被苏联的叛逆者把它从祖国攫夺了过来。另一方面，那些坚决主张维持一个独立的摩尔多瓦国家的集团则害怕给予科姆瑞特的地方精英以自治权只会更激发加高兹激进分子提出完全独立的要求。

这两派势力在1994年初苏联解体后的第一次选举后都被推至边缘位置，而属中间派的农业民主党（ADP）在选举中获得了议会的多数席位。和总统斯内格（随后也成为ADP成员）的主张相似，农业党人的兴趣在于尽快了结与加高兹的冲突；此外，斯内格和他的ADP盟友急切想反击泛罗马尼亚主义者，强调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间的差异，这个党内的很多成员认为给予加高兹某种形式的自治可以正好与罗马尼亚形成鲜明的对比：罗马尼亚拒绝考虑给予其境内的匈牙利人（Hungarian）以自治地位。

1994年8月，由ADP占主导地位的新议会通过了一个新的宪法，其中第111条允诺给未被承认的“加高兹共和国”所在地区以“特别的地位”。1994年12月一项针对加高兹的更详尽的法律由摩尔多瓦议会和加高兹领导层通过并由斯内格总统于1995年初公布（Constitutia 1994, P.35; Gamova 1994）。依照这项新的法律，一个特别的“地区自治单位”作为“加高兹人民自决的一种形式”和“摩尔多瓦共和国的组成部分”成立了（‘Lege’ 1995）。这个在加高兹被称为“加高兹耶里”（即“加高兹之地”之意）的新单位被赋予了相当的地方权力。1995年5月和6月，经当地公民投票选举出了行政首脑（Baskan）、执行委员会（Bakannik komitesi）和立法机构（Halk Toplusu），这些机构的负责人被赋予了对当地资源、经济、司法及其它领域的权力。只有一些主要的功能如公民权的认定、外交政策、货币的流通与发行以及国家安全等则由摩尔多瓦中央政府唯一控制。

加高兹语、摩尔多瓦语和俄语三种语言都被定为官方语言，这一规定是为了缓和1989年由于



宣布将摩尔多瓦语（罗马尼亚语）作为唯一的官方语而在加高兹引起的恐慌。此外，此法律规定，如果“摩尔多瓦共和国发生地位改变”的事件（假设与罗马尼亚统一），加高兹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这一预备性的条款既缓解了加高兹对摩尔多瓦最终会回归罗马尼亚本土的担心，同时也间接维护了摩尔多瓦的领土完整：因为任何迫使这两国统一的努力都会导致加高兹运用新法律的此条款，这样，基什涅夫和布加勒斯特（Bucharest）的支持统一势力在采取进一步的统一举措时就会遇到极大的障碍。这很奇怪，分裂领土的立法保障却变成了防止分裂的首要壁垒¹⁰。

不过，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将如何运作还不是很清楚。1989年首次宣布成立但未被承认的“加高兹共和国”的界限范围包括五个行政区。但是新法律并没有简单地将这些行政区承认为新“加高兹耶里”的组成部分，它是以单个的村庄，而不是以行政区作为管理的基本单位。依照这项法律的规定，在加高兹族人口占50%以上的居民点，可通过地方公民投票，如获多数票通过则进入新的行政管辖区域。

1995年3月进行了第一次公民投票的浪潮，这次投票有3个市镇和26个村庄选择加入“加高兹耶里”。其它任何居民区也可以在当地三分之一以上人数的提议下，通过类似的公民投票方式加入这一新统辖区。但是，加入这一新辖区的居民区很少在地域上是相邻的。这个新的行政管理单位由分散在非加高兹族（主要是摩尔多瓦和保加利亚人）居民区的几十个加高兹族村庄组成，这种补丁式的分布状态使对这一地区的管理极为复杂。谁应该为当地居民提供商品及服务，中央财政的哪一部分该划入这一新行政单位，地方领导人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其组成部分（村庄）不享有统一边界的地区等都是政策制定者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Pasali, 1995）。

对加高兹居民区人口分布的统计结果同样使将政治、经济及文化权利向地方的移交变得很困难。据1989年的人口统计，在组成未被承认的那个加高兹共和国的五个行政区中，只有两个区中的加高兹族人占绝大多数。在整个南部地区，不超过50%的居民区的居民主体是加高兹族人（即约占总人数的20%左右），而加高兹族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居民区只占总居民区的28%。只在科姆瑞特地区加高兹人为主的村庄才占多数，而作为地区中心的科姆瑞特和辛亚迪尔-朗加是唯一两个稍具规模的加高兹人口占多数的城镇（Dron 1994）。南部地区的其他人口主要由摩尔多瓦人和保加利亚人构成。在名义上统称为“加高兹”的五个行政区内，加高兹族人占总人口的47.2%，没有达到多数。这样，当地非加高兹族人与新近掌权的加高兹族官员间的关系就会成为冲突的潜在根源，尤其在当地的精英们为得到中央政府拨下来的发展基金而竞争和争夺对当地资源的控制权时。

苏联解体后各共和国的少数民族政策

加高兹的个案表明，即使在民族间冲突达到暴力冲突或接近暴力冲突的阶段，只要能冷静并富有想象力地处理地区分裂主义，是能够恢复中央与边缘地区间的秩序和信任的。在中央成立一个值得信赖的委员会以满足地方民族群体的文化要求并不会给中央财政造成多大的负担；承认过去对少数民族群体的一些做法是错误的，并广泛承诺对特定民族群体文化及语言的不发达状况进行改善，这些做法所费不多但能表现出中央的诚意，并能阻止冲突扩大成全面暴力冲突。

在对待少数民族提出的诸如提供民族语言教育、用当地民族语言出版书籍等需要较多投入的

¹⁰ 有关“加高兹耶里”立法方面具体的处理方法，参见King (1995b)。



要求时，寻求国内外各种非官方的资金来源不失为一条好的途径。在这一个案中，中央的外交政策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承认其他“亲属国”（kin states）对本“主国”（host state）内的与其同民族的群体之权利表示的关心——比如包括友好合作条约中的互利条款，这样做既有助于保持与邻国间的友好关系，又从根本上削弱了“主国”内部对极端分子的支持势力，而且还使其他“亲属国”的领导层确信其同族人口的散居状况并没有成为一个需要动用国内政治手段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摩尔多瓦政府鼓励加高兹知识分子向安卡拉寻求文化及经济支援，尽管有些加高兹人自己对发展其突厥族特性并不太热心。

不过，加高兹的个案同时也使前苏联的各共和国在制定全面的少数民族政策时必然会遇到的很多问题凸现出来。首先，一旦中央政府与地区民族领导之间的冲突两极化，那么着手与地区领导人谈判就必然使某个声称代表了这一个少数民族群体的集团的地位合法化，而这种声称的代表性很可能是不确实的。这正是南摩尔多瓦的加高兹地方反对集团（如加高兹人民党）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他们断言科姆瑞特的领导层只是把地区自治权和各种文化特权作为一种手段，以保持他们在共产党时代在当地享有的统治地位。

确实，一些主要的加高兹领导人（包括“加高兹耶里”的最高长官）都曾原地方议会的首脑，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转型期间的政治与经济动乱为他们自己捞取个人和经济方面的好处。基什涅夫方面与这一地方领导层谈判就必然加强了其地位，因为这样他们就被认定为加高兹族的代表。尽管加高兹新的机构选举导致了一些激进派领导人的失势，但其他激进领导人可以将他们力促加高兹独立的主张转为通过对“加高兹耶里”内部的选举来产生影响。因为苏联时期的领导层宣称自己具有合法代表性，要抹平以前遗留下来的管理问题现在已更为困难了。

其次，创立一个少数民族的地区自治行政机构的技术细节也总是很复杂的。在加高兹的个案中，因为地区组织的基本单位被定为村落而非行政区，因此，各地方行政实体如何协调他们的行动仍是不甚明了的。举例说，如果一个加高兹人占多数的村庄，它是“加高兹耶里”的成员，但它又被其他保加利亚人或摩尔多瓦人占多数的居民区隔开了，那么，怎样为这些孤立的加高兹人提供教育与公共服务呢？尽管中央政府有此诚意，但前苏联的人口规模与分布的这种结果却是创建一个高效和能迅速作出反应的地方政府要面临的主要障碍。

最后要指出的是，东欧和前苏联的民族间冲突从来就不完全是国内事务。每一次冲突，不管是潜在的还是明显的，都对邻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造成冲击，而国外的同民族团体的地位则会被地方政治活动家用作重要的政治资本来源。在某些情形下，这些冲突的国际化可能成为正面的促进力量：摩尔多瓦发展与土耳其的关系就确实使其与加高兹的冲突得到缓和，因为这样做从根本上摧毁了一些极端激进派所宣扬的认为基什涅夫正致力于消灭加高兹族的语言和文化。但是在更多情况下，很多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自身的虚弱会使其他“亲属国”会把这些国家中同民族的散居人口的诉求用作它的一种有力的政治工具，从而使它与“主国”的关系变得紧张。这些国家面临的挑战将是既承认国外势力合法的安全及文化的利益，又维护对自己国内事务的控制。这些政府在任何程度上能够成功地在与被政治动员起来的少数民族达成公正的协定和同时维护中央政府的统治权这二者间达到平衡，是后共产主义国家能否保持稳定的决定性因素。

（译者：李霞，北京大学 社会人类学专业 1999年博士研究生）

